

# 在“问题”与“主义”之间： 论费正清的毛泽东研究<sup>①</sup>

王亚茹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46)

**摘要:**在费正清学术兴趣及理论框架中,毛泽东善于从政治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服务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其核心特征是用农民阶级代替产业工人成为革命主角,循序渐进地建立起一套适合中国土壤的理论纲领。费正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创造性“误读”,为后来西方学界关于“毛主义”概念的生成,提供了一种前瞻性知识图景。费正清从“总体性”意义上对毛泽东研究所作的顶层设计,以及从多重视角出发展开的多维度探讨和概括,深度勾画了毛泽东的思想肖像,为海外毛泽东研究转向学术研究和创新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准备。

**关键词:**费正清;毛泽东研究;毛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8)05-0023-08

20世纪40年代,世界战争的硝烟仍在继续萦绕,美国政府成立“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小组,随时势而制定美国对华战略防御政策。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场域中,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进入了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视野。这种研究视域的转变可以从作为美国毛泽东研究重镇——“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前身是东亚研究中心)历史略见一斑,该中心从美国国防部和空军拿到一笔大额的政府资金,主要用于中国共产党的人物和事件研究<sup>①</sup>。在“中国问题研究”发展历程中,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美国“中共学”与毛泽东研究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他不仅提供了诸多具有参考价值的决策和风险评估,同时也展开了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创造性误读,形成了后来西方学界命名为“毛主义”的知识图景。本文拟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与《中国新史》等著作出发,

力图对费正清视域中毛泽东的思想及其理论性质作出较为完整地勾勒,并试图对费正清上述思想作出基本分析与思考,以期为深化国内毛泽东研究提供借鉴。

## 一 原初话语:西方学界“毛主义”概念产生的历史语境

在费正清卷帙浩繁的著述中,他以一位史学家的敏锐洞见,聚焦分析中国社会的局势和行动者。在文本结构设置上,他主张把1921-1927年称为“中国的教条阶段”(Orthodox stage)<sup>②</sup>;把1927-1935年间称为“农民革命阶段”(Peasant stage)<sup>③</sup>;把1942-1944年间的延安整风运动视为“毛泽东思想形塑期”;把1945-1946年间视为“共产党崛起称雄的时代”<sup>④</sup>。除按时间线索延展开外,他还在中国史研究路径中安排了一条理论

<sup>①</sup> 收稿日期:2018-05-1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7CKS006)

作者简介:王亚茹(1990-),女,安徽铜陵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

<sup>②</sup> 薛龙:《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50年史(1955-2005)》,路克利译,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94页。

<sup>③</sup> John King Fairbank. "Review: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5-1949",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31, No.3 (May, 1972), P. 654.

<sup>④</sup> John King Fairbank. "Review: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5-1949",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31, No.3 (May, 1972), P. 654.

<sup>⑤</sup> John King Fairbank and Merle Goldman. *China: A New History*.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336-379.

暗线,即“毛主义”观点的逐渐呈现,从而对事件史进行了再现和概括。

早在1948年出版的专著《美国与中国》中,费正清已经概括地阐明了“毛主义”(Maoism)观点的要旨。他主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异常(Anomaly),这种异常是把农民运动作为革命的阶级基础。”<sup>①</sup>在学术倾向上,费正清想要告诉我们以毛泽东领导的共产主义事业不仅背离“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sup>②</sup>,而且偏离了“列宁和托洛茨基”<sup>③</sup>。因为“马克思本人提出农民是与私有制结合在一起的保守消极因素”<sup>④</sup>。而“在15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一直是一个农民的运动,而非无产阶级运动。”<sup>⑤</sup>“毛泽东打破了共产国际的教条开始组织农民的时候,他把他们称之为‘无地无产阶级’,并且用其他委婉语来隐藏它的非正统性。到1932年,他把共产政权基地放在农村,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在这里。中国共产主义借助组织起来的农民力量取得政权,农民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兵源和给养,当地的情报系统和劳力都支持八路军。”<sup>⑥</sup>因而,“它遵循的是中国革命传统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sup>⑦</sup>

费正清是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的“老师和向导”<sup>⑧</sup>,他在1950年前后指导史华慈博士论文《毛泽东崛起以前的共产主义》的写作。这篇“博士论文正文中四次提及‘毛主义’这一术语:‘毛主义的兴起’(第115页)‘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接受毛主义?’(第168页)‘毛主义的基本特征’(第189页)”<sup>⑨</sup>,可谓标志着“毛主义”概念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首次出场。史华慈对“毛主义”概念的界定主要受费正清的相关论述的深刻启发,其核心要义是“一个

信仰马列基本原理,按照列宁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党,这个党建立在纯粹的农民运动基础上”<sup>⑩</sup>。而史华慈的专著《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是基于《毛泽东崛起以前的中国共产主义》基础上稍作修改易名出版的。另外,由康拉德·布兰特(Conrad Blandt)、史华慈、费正清三人合作编著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sup>⑪</sup>中高频使用“毛主义”这一术语。可以说,在1948年到1952年期间,“毛主义”的基本内涵在其使用的过程中逐渐明朗化。

为应对魏特夫的“毛主义传说”(Legend of Maoism)的责难,费正清在1958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第2版中多次重申史华慈的“毛战略”“毛主义”,并继续以此为基础,极力主张“毛主义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已经不是外来的教义了”<sup>⑫</sup>。1987年首次出版的《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费正清运用“冲击—反应”模式来建构他的“异端论”理论体系,详细阐述了他对“毛主义”的理解:“1911-1949年的中国空档期(没有主导政府和意识形态)是一个对西方社会秩序理论最为敏感、最为强烈的反应期”,而“毛泽东这一代人,经历了儒家的衰落,为了拯救国家,接受了进步进化观念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与高涨的民族主义和对传统的反思融合在一起”,当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发酵之后,催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毛主义)”<sup>⑬</sup>。

由此可见,“毛主义”概念的提出及广泛使用,在直接意义上反映了作为海外学者研究对象的毛泽东思想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

①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p.260.

②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p.260.

③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p.261.

④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p.260.

⑤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p.260.

⑥John King Fairbank. "The Problem of Revolutionary Asia", *Foreign Affairs*, Vol.29, No.1 (Oct., 1950), p.103.

⑦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p.262.

⑧Benjamin I. Schwartz. "Acknowledgement",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51.

⑨Benjamin I. Schwartz. *Summary, Communism in China until the Rise of Mao Tse-tung*, Harvard University, Ph.D. Thesis, 1950.转引自路克利:《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2页。

⑩Benjamin I. Schwartz. *Summary, Communism in China until the Rise of Mao Tse-tung*. Harvard University, Ph.D. Thesis, 1950, p.234.

⑪《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是于1952年出版,该书结尾处提到1950年6月就已经完成写作。

⑫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240.

⑬John King Fairbank.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Harper and Row Press, 1978, p.287.

差异性问题的。换言之,尽管毛泽东的思想在语境上沿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统,但他最重要的革命思考——比如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是独特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的背离。值得注意的是,费正清曾使用“毛的思想”<sup>①</sup>(Mao's Thought),用于描述毛泽东的创新集中表现在实践领域,用于表示“毛主义”是一套独一无二的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他有时将“毛主义”置换成“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sup>②</sup>(Marxism—Lennism—Mao's Thought),突出强调毛泽东的思想已经发展成为普遍适用于中国的理论形态;此外,费正清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进行梳理后,他提出“马克思毛泽东主义”是一种道德说教<sup>③</sup>,更倾向于认为毛泽东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

## 二 质性特征:以“传统性”与“革命性”改造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论”

无论是在早期代表作《美国与中国》,还是在封山之作《中国新史》,费正清都花费了大量笔墨阐释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费正清标识出“毛主义”是一套独具特色的中国革命理论和战略,并由此出现了“行动风格”和“思想风格”两个方面交融并存的复杂关系和整体特征。

一是思想风格的“毛主义”具有原创性。依费正清所见,“马克思主义是从欧洲经验中生长出来的,但也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实际共鸣”<sup>④</sup>。所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积极吸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方面的欧洲源流’。一方面,来自卢梭,认为历史是道德剧,把革命视为实现美德统治的圣战。另一方面,源自重农主义者,认为技艺的进步,尤其是物质技术的进步,是

革命的中介,使得新的生产力,创造引领前进的阶级力量。”<sup>⑤</sup>但由于思想本身的局限性和相对性,“产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足以解决一个世纪以后的问题”<sup>⑥</sup>。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中国实际时,已经赋予其相当大的原创性和实用性”<sup>⑦</sup>。另一方面,费正清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管弦乐也有归属儒家的弦外之音”<sup>⑧</sup>。虽不能说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学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却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从形式到内容的应用和嫁接。“如果不了解中国儒家传统,就无法理解毛泽东的思想。”<sup>⑨</sup>比如,“实事求是”本是出自班固撰《汉书·河间献王传》,是指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而毛泽东则取其词,用以表达党的思想路线。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sup>⑩</sup>概而言之,毛泽东思想的产生绝非偶然,而是毛泽东在当时中国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舶来的马克思主义相联姻,循序渐进地建立起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二是行动风格上“毛主义”具有自主性。早在1946年费正清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共不是莫斯科的傀儡。”<sup>⑪</sup>并在1948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第一版中提出如下思考:“共产主义处在什么地位?”“它在多大程度上,像太平天国运动的基督教,仅仅是为了革命而借用的外国教条?是否已经变成中国的东西?或是受着莫斯科的控制?”<sup>⑫</sup>这些疑问同样困扰着美国政界和学界智库。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挫败,对美国政界和学界带来巨大冲击力。到底谁失去了中国?中国的胜利是不

①John King Fairbank and Merle Goldman.*China: A New History*.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395.

②John King Fairbank and Merle Goldman.*China: A New History*.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326.

③John King Fairbank. "Keep up with the New China", *New York Book Review*, March 16, 1989.

④John King Fairbank. "The New China and the American Connection", *Foreign Affairs*, Vol.51, No.1 (Oct., 1972), p.33.

⑤John King Fairbank. "China is Far", *New York Book Review*, September 3, 1970.

⑥John King Fairbank. "The New China and the American Connection", *Foreign Affairs*, Vol.51, No.1 (Oct., 1972), p.40.

⑦John King Fairbank. "Can We Compete in China?", *Far Eastern Survey*, Vol.17, No.10 (May 19, 1948), p.114.

⑧John King Fairbank.*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51-54.

⑨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53.

⑩《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⑪John King Fairbank. "Our Chance in China", *Atlantic Monthly*, September, 1946, p.41.

⑫John King Fairbank.*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pp.152-213.

是莫斯科的阴谋?费正清依据自己两次赴中国实地考察与研究(1942-1943,1945-1946),分析出中共取得抗战胜利的“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共产党人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性”<sup>①</sup>,并且“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sup>②</sup>的结果。毕竟“在找到土地革命与民族主义结合起来这一公式之前,共产主义在中国没有取得什么进展”<sup>③</sup>是毛泽东开始了中国式共产主义道路的探索。他“有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精神、自豪精神、倔强的性格,要寻求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sup>④</sup>。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到乡村中国的实际”<sup>⑤</sup>,科学细致地分析当时中国社会阶级状况,清楚地观察到农民的终极力量,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要求党内工作者必须密切考察农民的苦处和期盼,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所以,费正清认为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应组织和领导城市无产阶级的主张是多么不现实,而毛泽东着重动员农民以夺取政权和改变不可容忍的农民生活情况又是多么切中要害。“我们无法否定,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是一个适合中国而且连贯一致的纲领”<sup>⑥</sup>。这“在西方被称为毛主义,在中国谦虚地成为毛泽东思想”<sup>⑦</sup>。

由此观之,费正清十分肯定“实践先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起点中,毛泽东在知行合一上发挥了关键和主导作用。充分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之一,它的行动风格和思想风格极具原创性和独创性。但是,这里的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即“毛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和外延既有相通之处,也有质性差异。费正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界定为毛泽东个人,而非中共集体智慧,本质上具有明显的精英政治论的色彩。另外,费正清不仅多次将“毛泽东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同混淆

使用,并且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动态”无限延伸到毛泽东整个实践的发展过程,即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论探索与实践也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国内主流学界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核心观点、属性界划、研究立场是截然不同的。实事求是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形式转换,也不是从观念到理论的逻辑推演,更不是学院式的系统化理论作品,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问题的现实关切与理论回应。毛泽东在1938年是为了反对“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脱离中国具体环境,“离开中国特点空谈马克思主义”,是为了反对“洋八股”“空洞抽象的调头”和“教条主义”而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sup>⑧</sup>。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分析具体国情,形成特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指导实践活动的开展。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sup>⑨</sup>。

### 三 评价与思考:“毛主义”的理论实质从属问题

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哈佛学派基于其特定的理论立场、视域限定以及学科方法,使得其关于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的理论阐释呈现出与国内研究不同的异域色彩。尽管费正清对中国农民革命抱有同情与亲近感,并通过极力证明中国革命并非是“莫斯科阴谋”以力图扭转美国对华政策。但是他强调工人阶级主体性与毛泽东偏向农民之间的差异,这无疑增加了国外学者对毛泽东思想属性

① 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p. 273.

② John King Fairbank. "The Problem of Revolutionary Asia", *Foreign Affairs*, Vol. 29, No. 1 (Oct., 1950), p. 103.

③ John King Fairbank. "The Problem of Revolutionary Asia", *Foreign Affairs*, Vol. 29, No. 1 (Oct., 1950), pp. 101-113.

④ 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415.

⑤ 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p. 299.

⑥ John King Fairbank.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Harper and Row Press, 1978, p. 268.

⑦ John King Fairbank and Merle Goldman. *China: A New History*.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321.

⑧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⑨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6-47页。

界定的难度。如何评价费正清的上述思想?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关涉如下几个问题的解答:

第一个问题,既然费正清认为“毛主义”即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是“异端论”,那么,究竟何谓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

如前所述,就国外毛泽东研究的起源,决定了早期诸多的“中国问题”研究是从汉学研究中转型而来。他们的学术兴趣以及冷战时代西方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天然拒斥,决定其关于毛泽东的研究过程中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缺陷是不可避免的<sup>①</sup>。其中,就毛泽东思想性质的分析,亦即关于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格局的辨析,曾先后引发了较为著名的第一次和第二次论战,即关于毛泽东思想是“正统”还是“异端”的争论。以费正清、史华慈为代表的哈佛学派提出了“毛主义”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背离的“异端论”的观点,而右翼学者魏特夫则针锋相对地认为,根本不存在“毛主义”一说,相反,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是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庇护,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不过是一场莫斯科的阴谋<sup>②</sup>。这场关于“毛主义传说(Legend of Maoism)”的论战,在澳大利亚学者尼克·奈特看来,恰恰构成了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理论贫瘠”状况的集中表现。论战双方过于拘泥于深刻的意识形态印记以及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之甚少,致使他们仅是从毛泽东的文本及话语出发,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简单对照加以解读,每种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自己的立场、观点和结论进行辩护。但是实际上,其立论基础上存在一个明显问题,即裁决双方正确与否所依据的正统标准在论战中是缺失的,而所谓的正统思想并非一劳永逸地建构完成,其仍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之中<sup>③</sup>。其上可追溯“苏联1931-1936年所确立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正统——对立统一规律处于核心位置,而随着1938年《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

义》的出版,这种所谓正统已然发生相应改变。倘若以苏联20世纪30年代初至中期所确立的正统为衡量基准,那么,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理解毫无疑问具有正统性。”<sup>④</sup>

尼克·奈特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很具说服力和影响力。但是,仅仅局限于尼特以上观点解读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关系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生机制和核心思想加以补充。哲学是时代思想的精华,是对自身所处时代的人类生存困境的理论自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所作的精湛总结:“最终升华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是马克思对所处的时代和世界的深入考察。”<sup>⑤</sup>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发展历程,马克思恩格斯持续不断地在文本与现实的双重认证中加以理论推进,他们的目标是,将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高度统一起来,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思维方法,丰富精准地揭露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诡辩性、矛盾性、复杂性,全面系统地阐释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一般规律;始终坚持在实践中奋力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奋力实现人的现实幸福。在这样的语境下,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明确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sup>⑥</sup>基于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卢卡奇这样解读:“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

①张明:《尼克·奈特“重思毛泽东”的理论规划及其思想效应》,《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11期。

②尚庆飞:《国外毛泽东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4-63页。

③尼克·奈特:《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规律思想的“正统性”》,张明译,《现代哲学》2014年第5期。

④尼克·奈特:《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规律思想的“正统性”》,张明译,《现代哲学》2014年第5期。

⑤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7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题中的正统方法仅仅是指方法。”<sup>①</sup>理论之花易凋,实践之树常青。时至今日,我们不该仅仅停留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作的个别论断,而应是高度把握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与时俱进”的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批判性和革命性。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从来不是一般的教条原则或静态的宏观体系,而是在人类历史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具有开放性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具体运用中必然会改变其形式,但绝不会改变其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从这一点来说,毛泽东思想是坚持经典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框架下所进行的量变,而不是取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根本性质变。

第二个问题,既然费正清认为毛泽东对农民阶级的依赖本质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那么,如何面对谁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阶级——是“乡村农民”还是“城市工人”的拷问?

“和任何其他单独的话题相比,‘毛泽东开始关注农民’,这或许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被人们讨论最多的话题。”<sup>②</sup>从直接显性层面而言,毛泽东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强调工农武装割据,发展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按此逻辑,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似乎没有任何内在联系。但是从更深层次思考,费正清采用的经验主义解读研究方法<sup>③</sup>,致使他的理解既不符合毛泽东的思想,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意。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僵化状态,而是处于不断丰富完善的历史性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特殊事件中,必然会出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难题和新特点。所以,我们应该回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以及中国革命实践史这三大“历史坐标”的具体语境中回答这一问题。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视域中,城市产业工人即是无产阶级的代名词,被赋予了革命主力军与资本主义掘墓人的使命<sup>④</sup>。而近代中国因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意识与生产方式根深蒂固,资本

主义发展严重不足、城市产业工人力量极其弱小。但因毛泽东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后,最先将目光聚焦工人阶级而非农民阶级,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支点,并非如海外学者所言,农民阶级从一开始就是被关注的焦点。正如毛泽东指出:“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sup>⑤</sup>随着党组织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毛泽东深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规定。为解决新世纪人类生存困境,不仅在于解释旧世界,而且在于实践新世界。所以,当西方以殖民扩张形式向中国强行输入现代性之时;当国民党对共产党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围剿之时;当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和干部滔滔不绝地讲着马克思主义的套话官话,却完全不去努力实地调查和深入理解中国现实之时,毛泽东几乎倾注了所有他能够为之倾注的精力解决以下问题:中国究竟应该如何摆脱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究竟应当向何处去?如何确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语境中行之有效,以提高共产党人顺利实现革命目标的能力?

毛泽东深知要以革命与实践解决重重矛盾,就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分析中国社会的具体历史情境,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换成改变中国现实科学的科学方法,如实事求是方法、矛盾分析方法、调查研究方法等。通过对中国社会进行实地调查,在1927年的秋天,毛泽东作出了不得不上井冈山的选择。其关于劳工阶级社会历史地位的认知也在循序渐进地建构完善中。一方面,毛泽东对农民阶级的社会历史地位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由原先感性经验层面的理解转向从物质生产以及生产方式出发发掘农民阶级的社会历史地位。他表示农民阶级是中国人口和革命力量中的绝大多数,只有团结全民族最大多数人共同奋斗,方能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中一道道极为复杂的难题。另一

①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商务印书馆第1992年版,第49页。

②Benjamin I. Schwartz. *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35.

③参见尚庆飞:《西方学者视域中的毛主义文本阅读与模式转换》,《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6期。作者在文中提出西方学者阅读毛泽东的三种模式:经验主义阅读模式、深度解读模式与扩张性解读模式。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⑤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页。

方面,毛泽东对工人阶级社会历史地位的认识也经历了从自觉向不自觉、由原先主观判断转向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解释工人阶级的社会历史性地位。他尽可能努力提升工人在政党和大众组织中的领导地位,鼓励工会发展在城市地区的斗争,因为工人阶级所具备的社会和经济特征使他们拥有组织和领导的特质。

总体上说,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历史图景中,找到工人阶级作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而毛泽东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的思想逻辑、科学思维方法回答当时中国现实问题,在外敌入侵、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现实境遇中找到可以改变社会的行动者。毛泽东不仅寻找到了实践活动的主体力量,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社会历史发展主体概念的理解更具现实性,更加具象化。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精神的理解和遵循,也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持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第三个问题,如何正确认识与客观评价费正清在政治与学术夹缝之间所做的艰难抉择?

费正清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五十余年,他亲历美国“传统汉学”向“中国问题研究”的深刻转变,实现了从“新闻报道”向“海外中共学”的开拓性突进。二战时期,费正清应召加入美国政府组织筹建的战争目的服务的研究机构工作,并两次赴中国实地考察与研究。依费正清之所见,要真正厘清近现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复杂性,重要的是对中国实践发生学的研究。确实,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发展显现出许多始料不及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而实际工作的经验以及对中国历史研究的不断增进,在经历了无数艰难和曲折之后终于破茧而出,费正清回到哈佛大学后(1946-1952),他开始成为善于辩论的一员。他写了大量论述美国对华决策咨询报告、分析中国政治形势的政论文。他积极地向人们解释中国与美国的区别,“共产主义在中国是正义的,但在美国是邪恶的”<sup>①</sup>。

“他深刻感受到中国国民党的‘人浮于事,机构冗杂’必将失去人心,自信预判中国共产党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图景,所以他坚决反对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然而,美国公众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尽管这场关于中国问题的全国性辩论仍在继续着,但是这种辩论已经逐渐被外交领域兴起的冷战问题和在全民中爆发的‘大恐慌’日益浓厚的阴影所掩盖。”<sup>②</sup>20世纪50年代,费正清等因持“中国共产主义不是莫斯科的傀儡”等观点被怀疑是共产党间谍,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对于麦卡兰委员会指控费正清为危险分子的答复中,费正清表达的他的志趣始终如一,对于哈佛的依恋(如他有时所说的,那是他的宗教)”<sup>③</sup>。事实亦是如此,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寻求应用对策始终是费正清进行中国问题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表示“在中国问题上,办教育是对付麦卡锡最好的回答。如今是我们应该运用知识和理性解决问题来取代暴力和恐惧的时候了”<sup>④</sup>。所以,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在战后的年月里,费教授差不多是单枪匹马地在美国开创了近代中国研究这一领域。”<sup>⑤</sup>

建构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需要开展一系列艰苦的基础性工作。其中包括,对中国问题研究的理论资源的挖掘,对中国学的前提性问题的探讨与研究,以及组建科研团队并把学子送进美国各地高校教授关于中国的课程。费正清把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与毛泽东研究贯通起来。他非常注重文本与史料的充分占有,他认为在较为完全占有了毛泽东文本之后,就能够勾勒出毛泽东思想的完整肖像并对毛泽东的功过与智慧做出客观中立的评价。同时,费正清也强调了对语言的驾驭能力在毛泽东研究中的重要性。尤其重要的是,他注意到了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情感偏好。虽然费正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更多是建立在经验主义方法论基础上的初步涉入,但是相比较斯诺而言,费正清的研究性的成分就显得格外突出。正如“在史华慈看来,新闻与学术的‘最

①费正清:《费正清中国回忆录》,阎亚婷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394页。

②费正清:《费正清中国回忆录》,阎亚婷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369页。

③柯文:《我的老师费正清》,《文史哲》1994年第3期。

④费正清:《费正清中国回忆录》,阎亚婷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408页。

⑤柯文:《我的老师费正清》,《文史哲》1994年第3期。

后分水岭’不在话题的不同,而在于前者只提出当前局势中大家都关注的议题,后者则同时还能提出更加广阔深远的重大思想议题,探究一系列与人有关联的广泛而富有意义的议题,并且为这些议题打开新的丰富的探索领域”<sup>①</sup>。例如,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哈佛学派关心的一个核心论题就是毛泽东思想(更加倾向于使用“毛泽东的思想”一词)的理论来源问题。在如何认识毛泽东思想的组成要素及其理论性质等问题上,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曾先后爆发了两次较大规模的论战。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何对待这一问题直接构成了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理论分野的重要标识。斯图尔特·R·施拉姆基于海外毛泽东研究主流框架——由费正清与史华慈开启,认为毛泽东思想从底色上不外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改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异端说”;雷蒙德·F·怀利在承认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基础上,对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观生成的历史语境与支援力量进行了详细分析;约翰·布莱恩·斯塔爾则基于毛泽东政治实践的维度,从具体政治实践中梳理毛泽东思

想的哲学脉络。他们往往更侧重于对毛泽东思想的理性审思,更擅长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等工具来解析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的心路历程。从整体上说,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学者们试图跨越时空的局限,在不同的领域从不同的视角展开探索研究。因此,考察和反思海外学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学术研究对深化国内毛泽东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 结语

虽然费正清试图消解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在中国历史时期中的作用,以此证明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运动并非是“莫斯科阴谋”以力图扭转美国对华政策,但是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哈佛学派,从“总体性”意义上对毛泽东研究所作的顶层设计,以及多重视角出发开展多维度探讨和概括,深度勾画毛泽东及其思想肖像,无疑为西方世界学术化研究毛泽东趋势的开端提供了重要的助推力,也为之后的毛泽东研究在深度和广度等方面层层推进,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 Between “Problem” and “Imperialism”: On John King Fairbank’s Studies of Mao Zedong

WANG Ya-ru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Abstract:** Regarding John King Fairbank’s theoretical framework, Mao Zedong, who is good at availing himself of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uses the Marxism theories to serve the concrete practice of Chinese revolution. Its core feature is to replace industrial workers by poor peasants as the protagonist of the revolution, and then gradually to establish a program that suits the Chinese soil. John King Fairbank’s creative “misreading” of Mao Zedong and his ideas provides a knowledge picture for the later generation of “Maoism” in the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The top-level design of studies of Mao Zedong in the sense of “overallness”, the multi-dimensional discussion and generalization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the deep sketch of Mao Zedong and his ideological portraits, have undoubtedly provided an important thrust for the beginning of the academicization of foreign studies of Mao Zedong.

**Key words:** John King Fairbank; studies of Mao Zedong; Maoism;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责任校对 廖和平,龙四清)

<sup>①</sup>尚庆飞:《国外毛泽东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7-48页。